

## 绪 论

中国与日本一衣带水，是东亚的近邻。若以地区而论，则宁波（明州、庆元）同日本的关系最为密切，这种特殊的关系是由宁波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无与伦比的内在条件所决定的。

宁波位于东海之滨，属海洋性亚热带季风气候。每年夏季西南季风盛行，北赤道的暖流即从印度洋经南海、东海流向日本；春季在东北季风的吹送下，北冰洋的寒流又绕经日本循东海南下，这就使帆船行驶往返于日本与宁波之间十分便利。从港口位置来看，“宁波三面际海，北面尤孤悬海滨，吴淞、海门呼吸可接。东出镇海，大洋辽阔，南连闽粤，西通吴会。舟山突出，中洲延袤四百余里，控扼日本诸蕃，厥性咽喉之地”。<sup>①</sup>这种地理位置使宁波距日本“对马、壹岐诸岛最近”<sup>②</sup>航距最短，往来便捷。如大中一年（847年）承和十四年六月二十二日，日僧惠运、仁好、惠萼等乘张支信的唐舶，自明州望海镇东航到值嘉岛的那留浦，趁西南风只用了3天。咸通三年（862年，贞观四年）九月三日，日本真如法亲王等60人从值嘉岛趁东北风扬帆起航，其疾如矢，仅4天3夜即渡至明州杨扇山下的石丹岙。<sup>③</sup>再者，宁波地区河网交织，与南北大运河贯通，这又使宁波港拥有富庶的江南经济腹地，成为理想的内河外海联运港、丝绸陶瓷之路的重要始发港和以日本为东端的南海东海贸易圈的枢纽港。此外，宁波又是佛教传播的重要发祥地。

① 雍正：《浙江通志》海防。

② 民国：《鄞县通志》文献志。

③ [日]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出版第121页。

唐宋时代最受日本尊崇的天台宗，其发源地即位于明州西南的天台山。明州天童寺更是日本重要佛教派别曹洞宗的祖庭。再加上阿育王寺、瑞岩寺、雪窦寺等众多名刹，吸引着日本遣使和学问僧前往宁波。正是上述种种，奠定了宁波在中日关系中的特殊地位。

宁波同日本的关系，大致可以分五个时期。

众所周知，长江下游是中国水稻起源的中心，传入日本的“稻米之路”最大可能是以接力棒的形式，从长江下游传到山东半岛、朝鲜半岛、日本九州。而宁波的河姆渡是中国水稻的起源地之一。因此不少中日学者认为，河姆渡文化与日本绳纹文化之间可能存在某种关联，宁波可能是中国早期文明向日本传播的重要出海口之一。此后中国的《三国志》和《后汉书》、《魏书》等史籍记载秦始皇所遣方士徐福的东渡地为亶洲，亶洲之民以后常至会稽贸易，而会稽也有人因入海遭风漂流至亶洲，亶洲在会稽以东，所在绝远。后人据此推测亶洲即为日本。此外，宁波民间还流传着徐福系从宁波达蓬山东渡日本，甚至还留有所谓遗迹遗存。上述种种推测、传说虽不能作为信史，但恰恰也可从另一角度说明，从春秋战国时期起，已跻身于碣石、转附、琅琊、会稽等五大港口之列，并成为浙江和长江下游最大出海港的宁波，到秦汉南北朝时期，已大大拓展海上活动的范围，并同日本发生了较多联系。从远古时代到魏晋南北朝为宁波与日本关系的第一时期。

在隋唐五代第二时期，宁波同日本的交流出现了崭新局面。从隋代起，日本开始全面学习汲取中国文化。最初，日本遣使团的登陆地主要在山东半岛的登州一带。8世纪初，因朝鲜半岛新罗崛起，威胁日本入唐的北路黄海航线，于是改走南路东海航线，从长江口的扬州或杭州湾的明州等地入唐，这就是《新唐书》东夷传所谓“新罗梗海道（更由）明、越州朝贡”。东海新航线的开辟大大提高了明州在中日交流中的地位。随着明州私商的日渐活跃和瓷器、丝绸输出的不断增加，日本留学僧也纷纷到东南佛教圣地浙东

求法参禅，当时影响力最大的天台宗遂由此从宁波东传日本。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唐代宁波港不但成为和交州、广州、扬州齐名的四大港口之一，而且逐步确立了中日交往的首要港地位。由于唐末政局动乱，民生凋敝，再加日本在大量吸收唐文化后也须消化，因此从乾宁元年（894年，宽平六年）停止派遣遣唐使后，两国邦交遂告中断。但中国商人和日本僧侣往返两国之间反而频繁。五代十国时期因吴越国坚持发展经济，不介入中原内战，加上民间私商的继续发展，中日商贸仍然相当频繁，明州更成为中国对日本交通的唯一港口。

宋元时期宁波港的地位继续提升。北宋淳化三年（992年），明州在继唐代广州之后，也设置了市舶司，并渐次确定了东方贸易大港的地位。就与日本关系而论，北宋中期、南宋中期两次规定明州（庆元）为中国对日经济文化交流的法定港口。唯此时日本仍处于文化摄取的饱和状态，失去继续向中国遣使的热情，故两国邦交仍然未能修复，而宋政府为解财政困乏，积极鼓励民间海外贸易，因此以明州（庆元）港为中心的中日民间贸易在唐代基础上又有较大发展，达到鼎盛阶段。明州地方政府同日本大宰府间因贸易关系也屡有信札往来。文化交流方面，当藤原时代在吸收消化唐文化基础上创造出颇具本国特色的民族文化后，平清盛时期又开始大规模移植宋文化，由此引出了中日文化交流的新高潮。明州（庆元）凭藉其发达的佛教文化，加上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两国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和纽带，这种交流的主要形式则是两国佛教僧侣的互访。元代虽然两国政治交恶，但以庆元港为枢纽的中日民间贸易仍在继续发展，以僧侣为载体的文化交流也仍相当频繁。只是与南宋中期后两国商人双向往来相比，此时成了日商单向来庆元贸易。

明代宁波同日本的关系可用“曲折”两字予以概括。根据明政府的规定和大陆沿海港口的分工，宁波从明朝立国之初便被确定

为专通日本的港口，即中国与日本交通的唯一港口和仅同日本一国交通的港口。这虽然限制了宁波同其他国家的交往，但也进一步提升了它在中日关系中的地位，从而使宁波与日本的交往更加密切，地位更为特殊。由于明政府实施比前朝保守的海禁政策，而日本室町幕府则推行形式上承认藩属地位，与明朝通好的政策，于是便形成了非常态的朝贡勘合贸易体制。在此体制下，中日两国的邦交得以恢复，两国使节的往返也不绝于宁波，但就商贸和文化交流而言，则主要表现为日商、日僧的单向来华。随着中国江南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新航路开辟后世界市场的开拓以及室町后期日本国内战乱，幕府失势，以宁波舟山群岛为中心的中日私人贸易便趁势崛起。这种不合法的私人贸易与海禁政策冲突的结果，导致了由宁波发轫，历时数十年的“倭乱”，从而在宁波与日本的关系中添上了阴影。

清代为宁波同日本关系的第五个时期。当时宁波同日本的交通格局又有新的变化。就中国方面而言，自康熙帝开放海禁后，对日本交通出现了各港多元发展的趋势，特别是随着上海、乍浦港的崛起，宁波失去了自五代至明中后期形成的对日交往的垄断地位，但仍发挥着同日本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港作用。日本方面因江户幕府实施锁国政策，致力于自身文化的建设，两国邦交从明嘉靖年间中断后始终未能修复，两国交往也表现为仅有清朝商船单向驶往日本长崎。其间清朝对日本铜的需求不断加大，而中国向日本输出的丝和丝织品却呈下降之势。就文化交流而言，中国文化在总的发展水平上仍高于日本，但日本已将全面吸收改为有选择的引进。这种引进主要通过明末遗民和秘密招聘得以完成，其中宁波的朱舜水对此贡献最大。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日两国国情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两国交通的性质也随之有了质的变更，因此本书将研究下限暂定为清代后期的鸦片战争。以后若有机会，将再下延研究。

通过上述五个阶段的交通往来，不仅有力地推动了日中两国的经济文化发展，也谱写了两国人民之间友好往来的不朽篇章。期间虽也有冲突和波折，但主题始终是和平友好。由于宁波在两国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因此研究宁波与日本经济文化交流这一课题，既可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也有利于今天发展中日友好关系。

“别后不知君远近，触目凄凉多少闷！渐行渐远渐无书，水阔鱼沉何处问？”行笔至此，最值得感念的还是那些为了促进中日经济文化交流而不顾远航跋涉的艰险，默默无闻地做出牺牲奉献的两国土子、僧侣和商贾。

# 第一章

## 上古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宁波与日本的早期交流

日本是一个岛国，在它的发展历史中，其与外部的交流自然显得格外重要。因此，日本与中国的交流不仅构成了日本历史的重要内容，而且，也有力推动了日本历史的发展，深刻影响了日本社会的面貌。由于宁波所处的地理位置，使宁波与日本之间的交往历史十分悠久，在日本与中国的交流史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宏观地看，宁波与日本交往的长期历史又表现出若干阶段性特点，交流的方式在各个阶段中不尽相同，交流中的主角也有所转换。若以遣隋使、遣唐使为历史界标，那么，其前自上古迄魏晋南北朝，可以认为是双方交流的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尽管自汉代开始，有使节往来，但由于当时或以朝鲜半岛为中介，或走北路航线，因此，与宁波没有直接的关系。另一方面，宁波先民在不同的时间移居日本，从而带去了先进的中国文明，对日本历史的进步起了重要的推进作用。因此，移民在这一阶段中既是传播先进文明的主要渠道，也是宁波与日本关系的早期形式。

### 一、汉代以前宁波向日本的移民

日本的历史一开始就表现出十分显著的特点，那就是与大陆文化存在着非常紧密的关系。这种关系早在远古时代就已开始，距今约 2 万年前，地质学上的更新世时，日本列岛南北两端通过“陆桥”与大陆相连结，当时日本处于旧石器时代。从一些遗址中发现的石刀型石器与人的体质特征看，日本与中国文化有着密切

的关系，可能是中国人通过陆桥，为追赶动物等原因，从西伯利亚滨海沿岸从中国华北、东北——朝鲜半岛来到日本列岛，这是大陆迁徙日本最早的移民。

### 1. 河姆渡文化及后续文化对日本绳纹文化的影响

距今约 1 万年前，进入地质学上完新世，陆桥因海面上升而被淹没，日本列岛与大陆脱离，日本处于绳纹文化时期，即新石器时代。大致是公元前 12000 年至公元前 300 年左右，日本逐步形成有独特风格的固有文化。但细石刃文化与操截石斧除了出土于日本外，也还分布于中国东北、蒙古和西伯利亚东部，这就说明这一时期的日本与大陆文化仍有一定的关系。考古发现又表明，石块是日本绳纹前期的代表遗物之一，而中国的新石器时代在长江中下游也有广泛分布，一些学者据此认为日本绳纹前期的石块直接受到长江流域影响。又，出土于日本绳纹前期的漆梳，在河姆渡文化时期的漆器中就可找到它的源头。事实上，宁波在长江下游中是最具有航海条件的地方，因此，我们推测绳纹前期，河姆渡先民有可能漂流到日本，成为宁波去日本最早的一批移民，并对日本的史前文明产生影响。

移居日本的河姆渡先民，除了带去制作石块、漆器的技术外，应该还带去稻作技术。然而，日本学者赤泽建先生在《日本水稻栽培》中认为，日本稻作最早出现于绳纹文化晚期。<sup>①</sup>而以稻作农耕经济为主要生活来源却是在弥生时代（公元前 300 年至公元 300 年）因此，一种解释是可能因为气候等原因，稻作在日本绳纹前期仅仅是一种萌芽状态，稻作技术在当时乃至长期并没有对日本社会产生实际的影响。

不少中日学者认为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与日本绳纹文化之间有可能存在关联，并认为宁波是中国早期文明向日本传播的出

① [日] 赤泽建：《日本水稻栽培》，《农业考古》1985 年第 2 期。

海口。<sup>①</sup> 中日文化的关联无疑是文化传播的结果。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向日本传播的内容包括稻作、石块、漆器、建筑、石锛等。其中石锛是用来刳制、刨削木构件、木器、制作独木舟等的木制物的复合工具，河姆渡是发明、使用石锛的起源地。日本福冈和佐贺的吉野星等遗址也出土中国式石锛，主要是台阶型和凹槽型石锛。这表明至迟在日本弥生时代，中国式石锛可能已传入日本列岛，从日本出土的石锛型式来看，似乎由河姆渡向北逐步传播的可能更大。但即使不是从河姆渡直接传入日本，而是间接的传播，由于河姆渡是石锛的起源地，因此，河姆渡的石锛与日本石锛存在着历史的关联是完全可能的。

其实，文化传播不仅在地域上既有直接的传播，也有间接的传播，在时间上，也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而是需要逐次长期才能产生实际的功效。从日本稻作最早出现于绳纹晚期来看，绳纹晚期宁波先民可能再次移居日本。据此，宁波地区的稻作技术对日本社会产生影响的时间应该是在绳纹文化与弥生文化之交。

## 2. 越国遗民东渡日本对日本弥生文化的推动

公元前3世纪，日本绳纹时代过渡到弥生时代，这是日本社会的巨大进步，有的历史学家把弥生时代的转折与大化革新、明治维新并列为日本历史上三个重大转折。并认为这突如其来的日本弥生文化绝非日本绳纹文化自然演进的产物，而是高度发达的外来文化介入的结果。日本学者的研究支持了这一观点，日本学者发现，弥生人的骨骼与绳纹人存在明显差异，到弥生时代后期，这种区别又逐渐模糊，因此，认为在绳纹时代与弥生时代之交，有一批

安志敏：《长江下游史前文化对海东的影响》，《考古》1984年第5期。

周南泉：《试论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玉器》，《文物与考古》1985年第5期。

王心喜：《江南地区远古居民航渡日本试论》，《海交史研究》1987年第2期。

毛昭晰：《稻作的东传和江南之路》，《中国江南：寻绎日本文化的源流》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11月版。

外来人从朝鲜南部来到九州西北部，他们给日本带来了以金属器与水稻农耕技术为代表的文明，后来，又与当地的绳纹人混血，也即在绳纹晚期和整个弥生时代，日本、中国及朝鲜半岛有交往，这就是多数日本学者认为的外来人“渡来说”。

我国最早论及“倭”的文献《山海经·海内北经》中说：“倭属燕”，燕是中国战国时代至公元前 222 年被秦所灭为止，存在于河北北部、辽东辽西一带的国家，日本今冲绳县城岳贝塚曾发现战国时期燕国的明刀钱，可见日本与燕国有来往，或倭居于燕的影响之下。然而，移入日本的中国人不止一条路线，著名考古学家安志敏先生指出，弥生时代早期移民中，从江南一带越海东渡的吴越移民占据了主体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公元前 333 年，楚威王熊商灭越的时间相当于日本绳纹晚期，与日本进入弥生时代时间相差约百年左右。因此，非常可能的事实是，公元前 333 年，越为楚所灭，越国遗民因亡国避乱从宁波出发驾船东渡，带去了水稻栽培技术，这与日本稻作最早出现于绳纹晚期，时间恰好相契合。越国移民通过百年左右的努力，在使稻作经济成为日本主要生活来源的同时，也使日本社会演进到弥生时代。史载，越人擅长纺织细麻布，越王勾践为了讨好吴王，乃“使女工织细布献之，以求吴王之心”<sup>①</sup>，使国中男女入山采葛，以作黄丝之布”。<sup>①</sup>因此，越国遗民徙居日本的重要贡献不仅在于带去种植水稻的技术，也可能带去了纺织等其他先进技术，从而推动了日本社会的巨大飞跃。而且，这种飞跃不会仅仅局限于水稻种植，而是必然涉及社会的各个方面。就经济而言，就是进入了耕织结合的弥生时代。

### 3. “徐福东渡”与秦民渡海

中日交往在秦代，值得一提的是徐福东渡一事。关于徐福东

<sup>①</sup> 《吴越春秋》卷五《勾践归国外传》。

渡最早的记载是《史记》，《史记》多次提到此事 说徐福先后两次入海，第二次率领童男女三千人，并百工携带谷种等。然后，“得平原广泽 止王不来，”<sup>①</sup> 这事在《三国志》中又有了大的变动“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亶洲在海中，长老传言，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将童男男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山及仙药，止此洲不还。”<sup>②</sup> 徐福止住不还的地点明确为“亶洲”。成书时间晚于陈寿《三国志》的范晔《后汉书》又对此作了进一步的增补改动，并把这段事附在《倭人传》中，也就是日本之后，可能是把亶洲看作日本的一部分，至少是和日本有关的地方。这样，就把徐福传说和日本连接了起来。

汪向荣先生认为，从 8 世纪初成书的日本史书《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对徐福故事只字未及来看，一直到 7 世纪末为止，至少在中国还没有把它和日本相提并论，也就是说，到那时止，无论中日两国中的哪一方，都没有认为徐福所留止的地方就在日本。<sup>③</sup> 确指徐福留止之处为日本，可能是在 10 世纪中叶五代后周时，首先提到徐福率五百童男童女留止地在日本的是义楚的《六帖》<sup>④</sup>，而不是在正式的史籍中。从宋朝开始，这种传说就作为诗词文章的题材内容了 如欧阳修的《日本刀歌》 李白的《古风》等等，1339 年，北畠亲房撰的《神皇正统记》中开始记入徐福东渡留止日本一事，此事后在中日两国传播。

综观史书记载，有两个关节点存在明显的问题，第一，徐福泛海求蓬莱神山及仙药“止此洲（按文中指亶洲）不还”。这只是根据孙吴“长老传言”，而传言本身缺乏依据，不能说可靠。其二，范

① 《史记》卷一一八《淮南王列传》。

② 《三国志》卷四七《吴孙权传》。

③ 汪向荣：《古代中日关系史话》第 52~53 页

④ 《义楚六帖》卷二一《国城市部》

晔把徐福事附在《倭人传》后，意在认为亶洲与日本有关，但这没有什么根据。更大的要害是“止此洲”到“止此国”的变动缺乏可信的证明，亶洲其实不是日本。

由于作为原始材料在关键处多有漏洞，所以，徐福到日本之说就不能认为是历史事实。汪向荣先生说，传说有一定根据，但这个根据是指中国移民的史实，不是指徐福渡海到日本这件事。因此，徐福东渡至今得不到实证的支持，应该把它看成是中国移民于秦汉之际，为避乱而东求乐土到日本这一历史现象在文献与传说中的反映，这样比较妥当。

至于徐福东渡出发地的问题，也无从确证，所有的分析和古迹都只能证明它的可能性。而最重要的是，在徐福渡海到日本这一前提很难成立的情况下，出发地是否是宁波，对于中日关系史来说没有什么意义。

不过，从历史上看，中国船只确曾有漂流到朝鲜半岛南部的记录如《隋书》卷八一《百济传》载隋战船飘至舩牟罗国，大概指今济州岛。因此，也可作一设想，徐福率领避役的秦民渡海，遇风漂流，辗转到达朝鲜半岛上乐浪、带方二郡，后裔又在弓月君率领下移居日本，即历史上的“秦人”。这一设想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不是没有可能。当然，这仅仅是设想而已。历史上有些事在不能得到确证时，设想是可以的，关键是区分清楚设想与史实，不能把设想当成史实。

尽管徐福东渡日本带有传说的成分，但它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秦汉之际，出现过一次“规模空前、历时长久的民族迁徙浪潮，大批移民入海东求乐土”。<sup>①</sup>吴越移民入海东迁于日本西南沿海一些岛屿，他们利用海上通道，与故地宁波一带保持着往来，还进行一些贸易活动。《三国志》卷四七《吴书二·吴主权传》中关于“其

<sup>①</sup> 王勇、中西进：《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人物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上人民时有至会稽货布”的记载即透露了这一信息。同书又云，“会稽东县人海行，亦有遭风流至亶洲者”。可知越人移居日本的原因，除了政治战乱外，也还有航海中遭遇风险而漂流至日本的情况。

吴越先民的出海地应在宁波一带，他们移居日本各地，将他们的先进技能、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带到那里，并在土著中传播，因此，从史前到秦汉之际，是越文化通过多次移民向日本传播的阶段。

## 二、“吴织”与大陆文明的东播

1. 两汉、三国时期使节往来与东吴制镜技术的东播  
到西汉王朝，中日交往出现新的情况，《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中记载，“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云。也就是说，其时倭人形成一百多个部落国家，每年总要在一定时间来乐浪郡朝见。这是日本人通过与朝鲜半岛的中国统治机构的汉人接触，来吸取中国文化，与以往的中国移民有很大不同。可以这样说，中日使节交往最早应该开始于西汉。

东汉光武帝中元二年（57年）倭奴国王向东汉朝贡，光武帝赐以“汉委奴国王”的印绶。安帝永初元年（107年）倭国王遣使向东汉王朝“献生口”（奴隶或其他人员）。3世纪，日本列岛出现部落联盟国家邪马台国，与当时三国时期的曹魏往来不断，从魏景初二年（238年）起，十数年间邪马台国向曹魏四度遣使，献生口，及斑布、倭锦，曹魏政权封卑弥呼女王为“亲魏倭王”，并赏赐绶地交龙锦等等，魏景初二年（238年），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遣使献斑布二匹二丈。卑弥呼死后，其宗女壹与遣使来朝，曾献异文杂锦二十匹，<sup>①</sup>通过这些往还，日本遣使者目睹魏的壮丽宫阙和纺织品，引

<sup>①</sup> 《三国志》卷三〇《魏书三〇·倭人传》。

起了学习中国文化的巨大兴趣，从而推动了日本常弥生文化的进步。从斑布到“倭锦”或“异文染锦”反映了日本纺织技术的进步。这可能与倭国使节不断来中国朝见有关。总之，汉魏时期，中日关系主要是官方交往，日本遣使朝贡与汉魏封赐。

但另一方面，移民活动在这一时期可能仍有发生。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各地古坟中发现大量边缘断面呈正三角形，背面中央纹饰以米浮周代的神和兽为母题的铜镜，学术界称为“三角缘神兽镜”，伴随出土的还有一些三角缘佛像镜，存续年代在公元3至4世纪左右，即属于东吴镜，系吴地工匠铸造，可能是吴地工匠东渡日本所铸。这些制镜工匠东渡日本时不但带去了先进的制镜技术，而且，也广泛传播相关的文化。<sup>①</sup>

## 2. 东吴南朝时期江南文化向日本的传播

4世纪初到7世纪前半叶，日本进入考古学上的古坟时代。大和朝廷统一全境，成为日本古代国家形成的重要时期，也是日本吸纳中国大陆文化的重要时期。

从5世纪初开始，朝鲜半岛上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纷争，倭国援助百济，对抗高句丽与新罗。在战乱中，流落在朝鲜半岛南部的许多中国人乃至朝鲜本地人为避战乱，不能不南流，越海到日本。这一阶段来日本的移民主要有秦氏、汉氏和以王氏为首的文氏集团。他们长于养蚕、丝织手工业技术和精通典籍，被称为“新汉人”。

迁居日本的移民，大多有技艺之长，他们对日本社会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很受日本朝廷的重用。如充任倭使到刘宋的司马曹达可能就是熟悉江南情况的东晋移民。雄略天皇时代，数次出使刘宋的身狭村主青也是一位从江南东渡日本的移民，是孙权长子孙

<sup>①</sup> 林士民：《万里丝路》宁波出版社，2002年10月版；王勇：《古代日本的吴越移民》，《中国江南：寻绎日本文化的源流》，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11月版

登后裔东渡的移民，他在日本与南朝的交往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与身狭持主青一同出使的桧隈民使博德，也是中国移民。<sup>①</sup>又如和药使主一族则可能是梁帝肖衍的后裔，因医术为日本朝廷重用。

这一时期的中日关系除了民间移民外，也有官方的活动。根据中国史籍记载，自东晋义熙九年（413年）至刘宋升明二年（478年）止，倭国、珍、济、兴、武等五个王于永初二年（421年）、元嘉二年（425年）、元嘉七年（430年）、元嘉十五年（438年）、元嘉二十年（443年）、元嘉二十八年（451年）、大明六年（462年）、升明二年（478年）先后八次派遣使节去东晋、刘宋王朝，请求赐予封号。有的学者认为当时倭国使节与南朝的交往，可能还是通过朝鲜半岛进入中国的北方，然后再南下。《文献通考》卷324：“倭人初通中国也，实自辽东而来……至六朝及宋，则从南道，浮海入贡及通互市之类，而不自北方，则以辽东中国土地故也”。

正如木宫泰彦先生所说，这里所说的南道并不是指文武天皇（697—707年）以后的遣唐使从筑紫取道南岛，或从值嘉岛出发，一直横渡东中国海以扬子江口的航路，而是针对倭女王卑弥呼的使节自带方郡经由辽东陆路而到达魏都洛阳的那条北路，指从百济横渡黄海而言。因此，这一时期尽管日本多次遣使通聘，但由于航线的原因，日本与宁波之间没有直接交往。

东晋南朝时期，中日关系的内容除了民间移民以及遣使、封赐外，主要是两个方面：

（1）江南文化以百济为中介传入日本。百济的文化受梁朝的影响颇大，而日本则通过百济输入南朝的儒学、佛教和其他。《日本书纪》继体天皇七年（513年）六月条云：“百济……贡五经博士

<sup>①</sup> 王勇、中西进：《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人物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12月版。

段杨尔。”这是五经东传日本之始。三年后，又“贡五经博士高安茂，请代博士段杨尔。”肖梁承圣二年（553年，钦明天皇十四年），依例交替医博士、易博士、历博士等，日本又要求百济进献“卜书、历本、种种药物。”肖梁承圣元年（552年，钦明天皇十三年）十月，百济圣明王遣使“献释迦佛金刚像一躯、幡盖若干、经论若干卷”，并上表赞颂佛法功德，这是佛教正式传入日本之始。又有迁居百济的吴人贵信，将江南的琴艺传到日本，经由百济传入日本的还有盛行于江南的伎乐舞等。

（2）日本多次遣使招请江南的织布和裁缝技工。东晋时，应神天皇遣阿知使主人吴，《日本书纪》应神天皇三十七年（约当399年）二月条载：

遣阿知使主、都加使主于吴，令求缝工女。爰阿知使主等渡高丽国，欲达于吴。则至高丽，更不知道路，乞知道者于高丽。高丽王乃副久礼波、久礼志二人为导者，由是得通吴。吴王于是与工女兄媛、弟媛、吴织、穴织四妇女。

应神天皇四十一年（约当403年）二月，四名江南缝织女工随倭使到达日本，并在各地传授技艺。

刘宋泰始四年（468年，雄略天皇十二年）四月己卯，日本遣身狭村主青等出使于刘宋，470年正月，身狭村宋青与刘宋使者带刘宋所献的“手末才伎、汉织、吴织及衣缝兄媛、弟媛等”回到日本。可见天皇遣使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从东晋南朝招揽人才，输入文化，引进技术。

这里重要的是这些“汉织、吴织、衣缝兄媛、弟媛等”是由哪些人构成的？与宁波有没有关系？据史书记载，南朝初期，刘裕在消灭前秦之后，曾把关中的百工迁到南方，并将其中的织锦工匠集中起来，在丹阳（今江苏南京）组成了斗场锦署，以后斗场锦署便成为江南主要的官府纺织作坊，所以，刘宋织工中可能有来自关中的织

锦工匠。另外，江南本身就长江下游浙江地区而言，越人早在西汉以前，就以纺织著称于史，孙吴时，政府曾大力提倡种桑养蚕，发展丝织业。吴国虽没有“织纺”作坊，但后宫设置织室，在宫廷织室中从事织纺的劳动者中就有句章人，陈寿《三国志》中说：“吴主权潘夫人，会稽句章人也，父为吏，坐法死。夫人与姊俱织室，权见而异之，召充后宫”，<sup>①</sup> 这表明句章妇女已经能从事精工细织。六朝税制大体采用户调制，即按户征收赋税，民户纳调粟和调布。南齐武帝永明四年（486）五月诏“扬、南徐二州，今年户租，三分二取尺布，一分取钱”<sup>②</sup>。鄞、鄮、句章、余姚时属扬州会稽郡，交纳赋转主要是粟和布。为此，四明地区产麻多，民间织布也多。沈怀文在谈到浙东赋税时也说：“上绢年调巨万匹，绵亦称此，期限严峻，民间买绢一匹至二三千，绵一两亦三四百”，<sup>③</sup> 这说明这里的纺织业已发展到一定水平。因此，在去日本的“汉织”吴织、衣缝兄媛，弟媛等”中很可能也包括句章（宁波）的织工和缝女。

三国时期，日本列岛上居民衣着的纺织与缝制技术还十分落后，据《三国志》卷三〇《魏书·倭人传》云“其衣横幅，但结束相连，略无缝。妇人被发，屈紒作衣，如单被穿其中央贯头衣之。”可见，其时衣裳饰甚时简朴，但到了日本古坟时代，从出土的陶俑“埴轮”看，当时女子穿上下身分开但成套的裙服，男身着裤，显然要比《三国志》卷三〇《魏书·倭人传》中描述的情况进步好多。可见，通过刘宋一批长于纺织缝纫技术的工人的到来，把先进的缝纫技术引入日本，使过去简陋的衣着方式发生显著的变化。

如前所述，东晋南朝时期，日本以百济为中介全面吸纳江南文化。需要指出的是，吴越文化在江南文化中无疑占有重要地位，而

① 《三国志》卷五〇《吴书·潘夫人传》。

② 《南齐书》卷三《武帝纪》。

③ 《宋书》卷八二《沈怀文传》。

宁波与吴越文化在文化意义上自然是相关的。因此，如果超越了地域直接的角度，而是从文化交流层面来考虑，汉魏东晋南朝时期，是日本主动吸纳中国文明特别是吴越文化的阶段，而这也是宁波与日本关系史中的重要内容。